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最大的经济风险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美国就业谜题

更温和的脱欧可能是特雷莎·梅的最好选择

穆迪对中国严重的债务问题拉响警报

那些应该被忘掉的经济思想

中朝关系发展状况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黄杨荔

刘立群

李笑然

史明睿

申劭婧

伊林甸甸

杨 茜

章珏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美国最大的经济风险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7

导读: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弱化民主和政治强人的特性致使政策的决策变得飘忽不定,带来了经济风险。

特朗普如何重塑美国形象 10

导读: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对外交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特朗普和蒂勒森称之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并且在峰会上做了主旨发言。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次发言?他们又如何解读美国政府新的外交政策?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关系学者给出了分析。

美国就业谜题 12

导读:本文认为失业率并不能很好的反应就业市场的变化。当前美国失业率很低,但就业的增加很疲软,这主要是由于很多男性不愿意工作,劳工参与率下降导致。货币政策决议不应该再把失业率作为主要的参考指标,货币政策也无法解决工人工作意愿下降的问题。

川普总统版的重返亚洲 14

导读:尽管存在右翼民族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相反,更可能的是,由于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浪费了大量时间,全球化的速度将保持不变,甚至可能加速。然而,近年来全球化面临着强大的阻力,全球经济一体化急剧或暂时性放缓的风险不容忽视。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应该坚持国际化战略,同时也必须采取措施降低保护主义的风险。

更温和的脱欧可能是特雷莎·梅的最好选择 20

导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今年初公布了“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硬脱欧路线,但是6月9日的英国议会选举结果出炉,特蕾莎梅所属的保守党未能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地位。特蕾莎·梅或许不得不改变她在脱欧问题上的立场和对待方式。就当前面临的情况,更温和的脱欧可能是特蕾莎·梅的最好选择。

英国脱欧与系统性风险 22

导读:英国脱欧可能对金融市场带来相当大的破坏,市场担心这也会增加系统风险。本文回顾了这场辩论,认为系统性风险不太可能增加。尽管法律渠道、规章等价性的失效令人担忧,但在金融市场分割度上升、面临不确定性下市场参与者更加谨慎的情况下,系统性风险更可能下降。

只要央行保持稳健货币政策,就无需担心比特币 25

导读：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变化导致了数字货币的产生，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是由中央银行或者商业银行发行的，背后也没有政府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比特币。由于比特币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一端到另一端的轻松转移，许多人认为未来其终将取代货币。但是作者通过对其特点，风险的分析，认为这并不会成为现实。

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意味着什么 28

导读：特朗普已经公布从2015年由150个国家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中退出的意图。能源、环境与资源研究室主任Rob Bailey与Gitika Bhardwaj谈及了此举的后果。他认为，此举对巴黎协定来说会是一个打击，而中国则可能因美国的退出而获取领导地位。

聚焦中国

穆迪对中国严重的债务问题拉响警报 31

导读：本文认为，穆迪评级机构调低中国的信用评级的做法是正确的，中国的目前信贷泡沫非常严重，且在国际储备和经济转型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经济理论

那些应该被忘掉的经济思想 33

导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悠久、体系庞杂的学科。时代在不断前行，经济学的思想和观点也应该与时俱进。然而，是否有一些我们依然笃信的经济思想已经过时？若是如此，这些过时的思想又会给社会造成哪些麻烦？本文梳理了一些已经过时的经济思想。

战略观察

在韩国发展的不确定时期，文在寅开始执掌韩国政权 35

导读：2017年5月9日，在韩国举行历史性的 대선中文在寅当选为韩国新任总统。在当天，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在韩国发展的不确定时期，文在寅开始执掌韩国政权》一文，作者从文在寅当选新总统的得票率、其重返自由外交政策、面对的新障碍、新的世界格局和狭小的犯错空间等方面展开叙述。

虽有良好迹象，但中国的对朝政策并未改变 37

导读：近日，美国官方和民间对于中美之间合作解决朝鲜问题持有高度乐观态度，但是作者认为，中国政府日前表现出来的合作姿态只是为了向新政府示好，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在朝鲜问题上的诉求是维持边境稳定。但中国确实对金正恩政权日益失望，因此，美国决策者要向中国施压，提高双方决策透明度，并向其传递开展合作利大于弊的信息。

中朝关系发展状况 39

导读：在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测试、美国特朗普总统放弃“战略忍耐”策略实行压力迫使其放弃核武器以及韩国开始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发展环境越来越不稳定。其中，中国作为朝鲜的邻国、友好盟国在应对这一系列事件时略显被动，尤其是朝鲜的独断专行甚是让中国压力倍增。2017年4月26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中朝关系发展状况》一文，作者从政治、经济贸易合作与支援等方面叙述了中朝两国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叙述了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不同角色特征，最后展望未来叙述了朝鲜、中国将会面临的状况。

本期智库介绍 44

美国最大的经济风险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James A. Haley /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弱化民主和政治强人的特性致使政策的决策变得飘忽不定，带来了经济风险。编译如下：

一年前，在华盛顿特区的布鲁金斯学会研讨会上，哈佛经济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警告说，美国面临的最大的经济威胁是唐纳德·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无知的法西斯”政治的风险。当时，许多观众肯定认为萨默斯是在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我认为到今天还这么想的人会少很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萨默斯似乎非常有先见之明。五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被解职可能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特别令人关切的是，美国总统试图使前局长宣誓效忠于现任总统。在此事件后，一位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阿根廷朋友指出，这种事情让他想到了以往阿根廷的政治。

我想我的朋友正是想指出，弱化民主和政治强人的特性致使政策的决策变得飘忽不定。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美国的官员都应宣誓捍卫宪法。如果变成宣誓效忠于白宫现任，那简直就像是对“国父们”的诅咒。此外，总统的行动可能威胁到美国空前繁荣的经济基础。

考虑到这样的事实，特朗普做出的解职科米的决定就没有那么令人惊讶了。事实上，这与他竞选时主张的做法完全一致，特朗普一直在有意无意中企图破坏民主政府的关键机构，这些关键机构包括一个能随时报道总统行为、充满活力的自由媒体，以及一个完全独立的司法体系。更有甚者，国会也可能受到特朗普腐蚀。

特朗普主张的立法议程受挫失败，这似乎使他开始把目光放在参议院的规则上。但这种企图改变参议院规则的行为反而增大了他企图废除或替换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难度。

通过他的立法议程的失败受挫，总统似乎已经将目光放在了参议院的规则，但这种行为将使它更难通过的废除和替换的奥巴马医疗改革法。特朗普最近声称，在减税计划这一问题上，参议院应该无视通过法案需要参议院 60 个席位支持的规定，通过法案。他认为这么做可以避免原本在通过法案时，必须拉拢共和党和民主党中相对中立的参议员们形成一个共同联盟的做法。特朗普的这种言论不是巧合，因为他正在尽力请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帮助他完成立法。同时，他也承认如果没法改变参议院的规则，他极有可能没法争取到足够多的中立投票支持他通过法案。

问题的重点不只是特朗普想要推翻参议院“绝对多数”规则的传统，而在于他是想改变参议院的角色。作为世界知名的“最具审慎意识的机构”，传统上，美国参议院的成员对自己的机构，同时也为他们能够与众议院政治热情隔离开来而感到自豪。参议院更谨慎的立法方式，包括相互妥协和联盟的建立，是制衡机制的一部分，这是宪法之父们的天才之举。

总统提案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现状是故意设计出来的事实。毫无疑问，这种故意甚至有些散漫的过程在多年来给两党的白宫执政者带来了许多挫败的经历，但从美国的历史来看，也促进了增长和繁荣。这种恰当的结果反映了一个事实，既有的制度促了法律框架和政策的稳定性；反过来，这种稳定性也为长期决策提供了依据。

如果一个国家因受制于政策框架，产生很多武断多变的政治决策，那么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很可能因为政策的多变性而变得无利可图。如果基本政策框架受制于首元首们反复无常的想法，这将导致投资减少，储蓄也将流向政治制度可以提供更稳定政治环境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历史上能够利用其他国家的储蓄，包括资本与劳动比率较低的贫穷国家，以及那些预期投资回报率应该更高的国家。从理论上讲，资本劳动比率的这种差异应该导致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下坡”，但全球资本流动不同于水，实际上却是“向上”流动的。

美国能够利用全球储蓄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的特殊作用。全球的中央银行都持有美国计价的外汇储备，因为国际投资者在不确定性增加并且想要从资本的流动性中逃离的时候，美元就扮演着传统意义上避风港的角色。同时，二战后国际货币安排使美元具有了特殊的角色（其中一些，如夏尔·戴高乐的财务顾问所言，是一种“过度特权”），国际贸易的很大一部分交易由美元表示，用美金进行支付。

过去七年来，由于对关键政策框架的信心，美元一直保持着独特的地位。这一框架的两个要素尤其重要：维持美元价值以国内价格表示且大体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与价格稳定目标相一致的财政政策。在过去 7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当其中一个或两个处于危险中时，决策系统也可以做出反应以保持稳定。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通货膨胀威胁变得无法控制的时候，保罗·沃克尔将利率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使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以减少通货膨胀并消除通胀预期。当大规模削减预算赤字破坏了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时，罗纳德·里根改变了立场，缩减了自己的减税计划，提高了国会的税收压力，因为美联储可能会提高利率，防止巨额预算赤字加剧通货膨胀。

这两个案例说明了该制度在维护政策框架稳定方面的作用。该制度已经在以前进行了测试：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丑闻揭示了宪法制裁的力量，即使在

处理总统的“重罪还是轻罪”时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系统对于特朗普执政当局的潜在冲击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问题不是纯假设的。毕竟，如果参议院准备改变它的规则来给最高法院提名人提供建议和认同，那么，为什么不能修改其他规则以便能够在其他问题上获得多数票呢？如果参议院同意总统关于改变其规则的要求，那么它可能会同意任命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其他美联储成员，哪怕这些人在应该实行紧缩政策时更乐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又或者，国会可以无视自己的预算制定规则，引入新的规则，以提供一个长期（或至少 10 年）的财政锚定来应对过去财政过度扩张的问题。

这是推测，但并不意味着不可能的。毕竟，一年前，一个政治新手打破了所有既定的政治规范赢得了“不可能”的选举。如果这种投机情况可能对美国长期的经济利益构成风险，这种情况应该立即成为过去吗？

特朗普说他希望帮助美国人，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他用这种说法来捍卫他对决策的破坏性态度。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崇高的事业。但特朗普也确实对美国繁荣的基础造成了巨大伤害的破坏，而这种基础恰恰是美国在过去的近 250 年里能够成为世界楷模的原因。

关键宏观经济锚定（政策稳定性）的丢失会破坏美国金融特权的基础，这不是让美国再次大。这些做法将使美国变得更像其他工业大国：鉴于其规模，美国肯定在世界有重要地位，不再具有影响全球经济和拥有金融霸权的超大影响力，也会丧失全球经济规则制定者的地位。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与总统及其顾问寻求的国际角色的削弱相一致。

本文原题为“Biggest US economic risk may be policy uncertainty”。本文作者 James A. Haley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加拿大领导人的高级研究员，前执行董事。本文于 2017 年 5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如何重塑美国形象

Sholto Byrnes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对外交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特朗普和蒂勒森称之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并且在峰会上做了主旨发言。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次发言？他们又如何解读美国政府新的外交政策？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关系学者给出了分析。全文如下：

特朗普总统近期在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的阿拉伯伊斯兰美国峰会（US-Arab-Islamic Summit）上做了主旨发言，这次发言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我们不是来这里说教的。我们不打算对别人指手画脚，教导别人应该如何生活。与此相反，我们希望基于大家共同的利益，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建立更加亲密的合作关系。”

不过，尽管世界上有无数国家都早已厌烦美国的说教式外交，但还是有一些人权组织对特朗普总统的此番表态表示批评。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这种表态相当于对侵害人权的行为了妥协。无独有偶，早在今年三月份，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蒂勒森就打破常规，拒绝在年度人权报告的发布会上大做文章，这同样引起了许多人权组织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特朗普虽然自称坚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但实际上只是走上了强权政治的老路。愤世嫉俗的人权人士表示，特朗普的新外交政策无异于开了历史的倒车。

客观地讲，就算这真的只是简单的强权政治，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调整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不应该忘记，十多年前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罗夫斯特就曾有名言：“现实主义者最害怕的，是理想主义的后果。”而这十多年来中东地区愈演愈烈的冲突、不稳定和战乱，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强权政治”。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月向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发表的演讲很明显的展现出这一区别：“如果我们时刻不忘向别的国家强加源于我们本国历史的信念和价值观，那将极大地妨碍我们保卫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能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推行我们坚持的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价值观，我的意思是我们并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把这作为第一要务。”

换句话说，美国还是会坚持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只不过，在我看来，美国社会自身所坚持的价值观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或许，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政府会认为：“我们的国家近年来遭遇了不少困境，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也出了问题，但我们不在乎。就算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不合时宜，我们也选择掩耳盗铃，

绝不承认。”而特朗普上台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正如特朗普和蒂勒森“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所意味的那样，他们已经隐晦地承认了自己国家遭受的挫折，也承认自己的价值观并不是那么“普世”的。此后，美国选择基于共同的利益与国际伙伴合作，而不会仅仅因为两国的价值观有所出入，就在国际舞台上公开指责别人。

在我看来，这种改变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尽管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指责他人的价值观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自己社会所坚持的价值观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举例来说，西方社会对 LGBT 群体权利的看法就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那么，既然他们自己都要花上几十年时间来完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他们又凭什么仅仅因为当前别的国家跟自己的价值观有所出入，就对别人横加指责呢？

毋庸置疑，西方世界与我们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在本质上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但我们也有着不少显著的差异。如果美国政府现在愿意承认这种差异，并且采用求同存异的原则与我们进行交往，那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推行自己的价值体系，更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承担国际上的道义责任。恰恰相反，这种包容体现出了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智慧，并将为我们今后的协作打下良好的、坚实的基础。

本文原题为“[How Trump is reimagining America's role](#)”。本文作者 Sholto Byrnes 是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5 月刊于阿联酋《国民报》，并于 5 月被 CSIS 官网转载。[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就业谜题

Gerald P. O'Driscoll / 文 郭子睿 / 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失业率并不能很好的反应就业市场的变化。当前美国失业率很低，但就业的增加很疲软，这主要是由于很多男性不愿意工作，劳工参与率下降导致。货币政策决议不应该再把失业率作为主要的参考指标，货币政策也无法解决工人工作意愿下降的问题。编译如下：

在下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对政策决议仍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失业率数据并不是货币政策决定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指标，因为其背后仍有很多值得研究。

5月份的就业报告是一个谜题。就业的增长和失业率的下降对于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发出相反的信号。上个月就业岗位增加 138000 个，但三月平均增长仅仅只有 121000 个，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疲软。失业率数据下降到 4.3%，这在过去的 16 年里是最低的。另外，职位空缺一直都很高。而且，劳动力市场自愿退出率也一直在上升。这些数据都表明劳动力市场在收紧。

就业增长的疲软与低于平均水平的经济复苏是一致的。但通常来看，像我们刚刚经历的经济衰退，一般会伴随着较强的经济复苏。当前的情形显然不是。

失业率并不是指不工作的人数。它包括不工作的人以及正在找工作的人。如果人们停止找工作，他们会被移除失业人数和劳动力人数。这会引起失业率下降，即便没有人得到新工作。因此，失业率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晰的描述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在经济衰退时期，有一些沮丧的工人放弃寻找工作，退出劳动力市场。当经济开始回暖复苏时，这些悲观的工人重返劳动力市场开始寻找工作。因此，失业率的下降可能并不能反映经济复苏的强劲，而是人们不愿意工作，劳工参与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因素一直是解释劳工参与率下降的原因，随着有更多的人在学校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及婴儿潮的退休，导致劳工参与率下降。

劳动力的主力在 25-54 岁之间，人口因素很难进行解释。退出劳动力的主要是男人，在 25-54 岁的年龄段，50 年前不找工作的比例是 6%，在 2015 年是 15%。如果劳工参与率像 2000 年时那样高，会有数百万的人被雇佣。

什么原因导致的？

经济政策一定会影响工作决定。自从经济衰退以来，有大量的人申请社会安全残疾保险而不愿工作。较早的在 62 岁退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文化和价值的改变导致蓝领工人失去了工作热情和工作的责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不愿意工作会带来深远影响。经济上，会拖累就业增加和 GDP

增长，社会成本会更高，男人没有工作就没有尊严。当然会有一些政策解决这一问题，但货币政策无法解决。

最后，我们想强调疲弱的失业增长是由于男人不愿意工作导致的，并不是由于经济需求不足。不管我们是否处在充分就业状态，失业率的变化并不能很好的描述就业市场的变化，不宜作为货币政策的决定的重要参考。

川普总统版的重返亚洲

Uri Dadush /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尽管存在右翼民族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相反，更可能的是，由于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浪费了大量时间，全球化的速度将保持不变，甚至可能加速。然而，近年来全球化面临着强大的阻力，全球经济一体化急剧或暂时性放缓的风险不容忽视。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应该坚持国际化战略，同时也必须采取措施降低保护主义的风险。编译如下：

本文简要回顾了近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试图解释全球化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持续存在的驱动因素和为何在将来可能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并研究新的保护主义的原因和前景，最后，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影响。

一、近期全球化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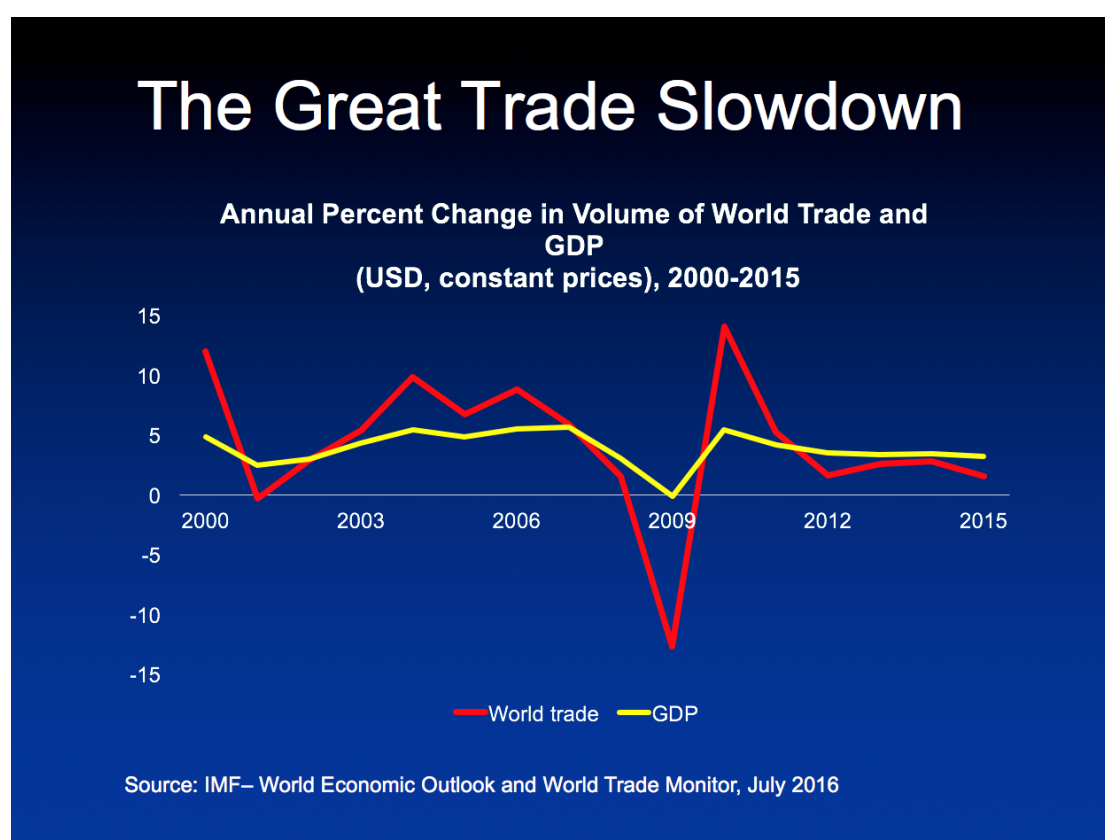
近年来的全球化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二战后，我们看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展很大；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速，这反映在几个统计数字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占世界 GDP 的比重从 1990 年的不到 40% 提高到今天的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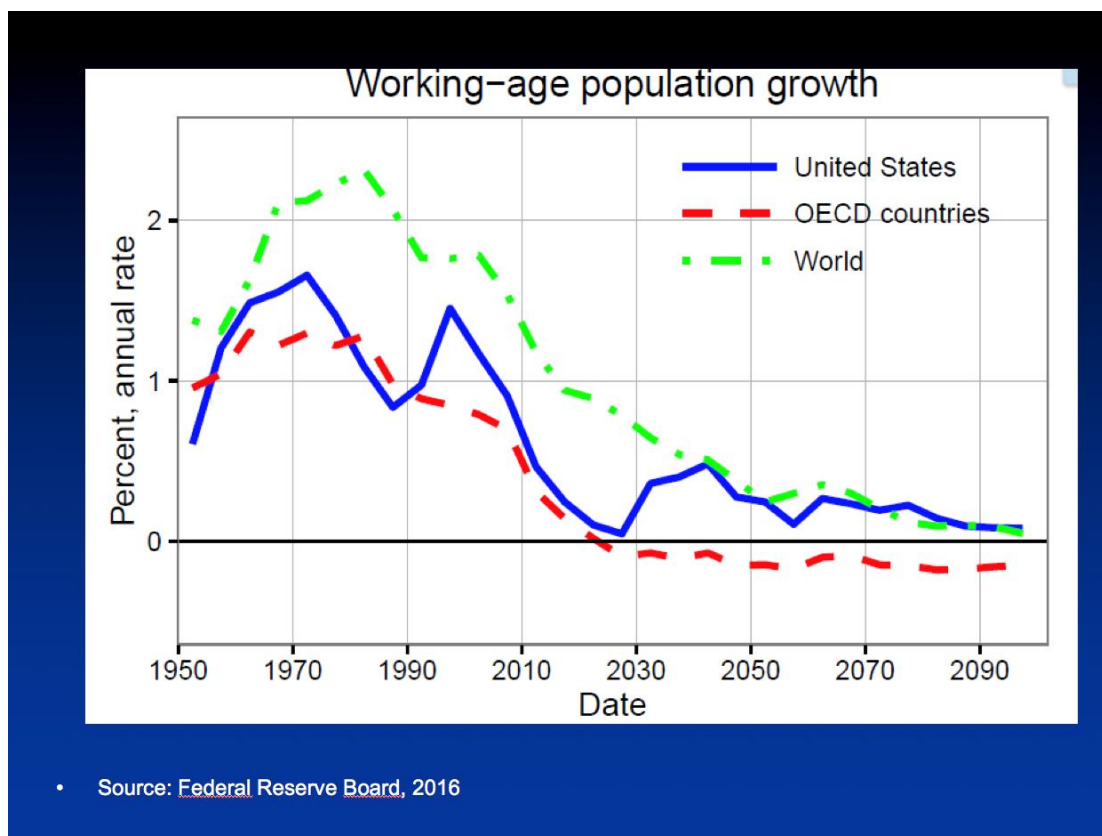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例已经增长了两倍；国际资本流入占发展中国家 GDP 的比重增加了 2/3；过去 20 年中，国际旅游人数也已经增长了两倍。

此外，占世界人口 80% 且比例还在不断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充分参与者，也是当今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目前，发展中国家约占全球 GDP 增长的 2/3，其相互之间的贸易（南南贸易）是世界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并将在未来持续下去。

可以说，自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最重要的单一指标——世界贸易已经大幅放缓——原本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是 GDP 的两倍，而现在仅与 GDP 的增速一样，导致一些人认为这标志着全球化的终结。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真正的情况是，危机爆发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暂时受到了百年一遇的积极冲击，即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经济主流，而这一事件不会重演。而且，全球人口的增长也明显放缓，世界工作年龄人口预计会持续减少，这意味着 GDP 和贸易增速的下降。



贸易放缓的最大原因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投资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因为这两者都严重依赖市场和零部件贸易。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世界贸易的减速主要是由于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随着经济复苏，贸易将再次加速，尽管不太可能保持危机前的增长率。全球金融危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冲击，造成了贸易放缓，但并没有阻碍全球化在许多方面的进步。

二、全球化的持续性

从长远来看，驱动全球化的力量比抵制全球化的力量更强。通过对几个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消退和加速的考察，我认为应将全球化视为由 3 种力量驱动的：市场，技术和国家。市场及运输、信息和通信技术，几乎总是会刺激全球化；但另一方面，国家往往是在勉强适应全球化。

市场是全球化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随着消费者寻求廉价而种类丰富的商品、企业寻求客户和更低的成本、投资者寻求更高的回报和多样化，他们不会只停留在本国境内。而对许多人来说，即使要远离家乡数千里，他们也希望生活得更好。因此，全球化可以被视为是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国际套利。

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对于全球化至关重要，它们降低了经济学家所说的“贸易成本”，从而使跨境的套利得以可能。

那么国家呢？各国往往遵循不同的想法、追求自己的利益。

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对亚当·斯密的推测进行了数学演算——在相当普遍的假设下，自由市场会导致资源的有效分配，即，在保证不减少其他人福利的情况下，不可能增加任何一个人的福利。这个数学结论既适用于整个世界，也同样适用于孤立的偏远山村。然而，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机会远远多于一个村庄内、甚至是美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内的套利机会。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总是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例如，出口占 GDP 份额高的国家往往增长较快；没有出口的增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迅速而可持续地发展。

然而，尽管经验和理论证据都支持全球化经济效益很高，但历史表明，各国可以在短期或长期内阻止全球化进程且常常这样做。

把国家看作能够打开和关闭全球化开关的机构是太小看它们了。为了让全球化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的允许远远不够。各国必须在全球化中发挥持续的支持作用。他们必须确立四个条件：和平与安全；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民的自由流动；跨国规章制度的一致性；跨地区或全球性的公共物品的提供，如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无线电频谱和互联网的管理。要建立这四个条件，各国必须合作。目前是国际性冲突较少的一个时期，但仍有很多相邻的国家共存却不合作的例子，而它们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是最小的。

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市场和技术的力量最终会胜过孤立主义国家——北朝鲜将本国人民与全球市场隔离开来，它生产核武器，并将 GDP 的 23% 用于国防，但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韩国是世界上全球化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国防仅占 GDP 的 2.7%。难道北朝鲜这样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吗？从长远来看，市场、技术和国家这三大的力量肯定都会确保全球化的持续进行。

三、目前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化也有消极的一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方面是，全球化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具有破坏性影响。此外，由于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无论是否直接接触到国际竞争，大部分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动者如银行柜员、卡车和出租车司机等，未来都可能被机器所替代。

近年来，发达国家常常将诸如呼叫中心和订单处理等许多工作外包给低成本的国家或地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处理这些工作能力的增强、以及发达国家的允许使其成为可能。虽然外包在贫穷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却增加了发达国家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的竞争压力。

其中一个后果是，美国现在的非熟练工人，尤其是 20 或 30 年前充斥着各个工厂的白人，挣得比以前还少。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尽管在某些劳动力市场流动性较低的国家，这一现象反映在失业而不是工资上。根据基尼系数和不同收入人群所占的份额，美国已成为仅次于以色列达的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且与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所差无几。

虽然经济学家和许多政治家倾向于分离贸易和技术的影响，认为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更多是因为后者，但这对于那些失去工作的人而言并不重要。并且，技术和贸易明显地相互依赖，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然而，虽然没有人认为国家可以、甚至应该停止技术进步，但许多人认为贸易可以、且应该受到限制。

这一切如何体现在政治上？正如智利和新加坡的领导人所表明的那样，至少一段时间内，各国不一定要实现民主才能在全球化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在像美国、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意愿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共识的支持，如果支持全球化的社会共识变弱，或者大部分人反对，那么民主国家就会退缩。尽管很多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可能会相信全球化，但民主国家更倾向于对群众的意志作出反应。

由技术和全球化引起的个人和区域不平等的不断增加只是导致新的保护主义的原因的一部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超国家机构如欧盟、世贸组织等侵蚀了各个国家的主权。当然，这些担忧并不是新的：20 年甚至更早前便有对不平等和侵蚀主权的忧虑。更近的则是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长时间发酵产生的欧洲危机、以及经济复苏速度缓慢的担忧。这些危机让人们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即决策者不仅无能，而且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往往是服务于自己的。

不过，最近的发展让人心安：马克龙（Macron）赢得法国大选的胜利，温和派在奥地利和荷兰的胜利等，最重要的是，唐纳德·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意图已被国会的多数党共和党所察觉和限制。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建立，全球经济一体化就不容易逆转。强大的商业团体，从零售商、零部件进口商到出口商，已经在开放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技术进步对于不熟练或半熟练工人的压力和低工资竞争的增加，应该抑制任何对于全球化的自满情绪。

重要的是要注意，如果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的计划被通过，美国就会面临更大的贸易赤字，并可能引起更大的贸易摩擦。并且，目前美国的政策对解决不平等现象没有任何帮助。减少对资本利得和高收入的税收及减少健康保险，只会增加那些全球化受害者的不满。我们仍然没有走出全球化的困境。

四、对政策的影响

大多数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都能在公共政策中直接或通过贸易协会发出自

己的声音。企业应该向政策制定者显示，公开市场决定了他们缴纳税收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增加了投入成本和商品价格，而且会招致报复从而对出口构成威胁。贸易战会使本国企业的海外销售能力下降，限制人口流动则会降低企业效率，反而使海外竞争对手有更多优势。保护主义会导致企业国际投资的价值下降，甚至可能使依赖国际市场的企业将其活动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增加国内就业。

保护主义对美国而言是一个特别反常的过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与其紧盯着双边贸易逆差，美国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家储蓄的不足（包括预算赤字），这才是国家长期总体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本原因。

企业应该坚持开放边界，但也应该思考企业和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减轻危机的影响和减少不平等。在美国，商业利益正推动企业税率大幅下降。企业是否应坚持减税？美国目前正在考虑的一个计划将为了给企业减税而取消数千万人的医疗保障。然而，全民医疗保险、教育投资和累进税制却是补救那些最有可能反对全球化的边缘人的核心政策。除了支持加强开放市场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外，企业应根据新的保护主义风险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对生产和服务链进行重大审查。

目前看来，全球化会持续的预测似乎更为合理。有一些美国企业顺应了特朗普政府的恳求，遏制外国投资并让重要商业活动回流。而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一方面，这些措施在商业方面不可持续，另一方面，政策可能会再次改变。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认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全球化的终结，更可能的情况是，全球化将来会持续甚至加速。不过，决策者不应低估贸易摩擦大幅升级的风险，他们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支持公开市场和那些有利于全球化受害者的社会政策。

本文原题为“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本文作者是 Uri Dadush，他是 OCP 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5 月刊于 OCP 政策中心和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更温和的脱欧可能是特蕾莎·梅的最好选择

Ryan Bourne /文 杨茜/编译

导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今年初公布了“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硬脱欧路线,但是6月9日的英国议会选举结果出炉,特蕾莎梅所属的保守党未能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地位。特蕾莎·梅或许不得不改变她在脱欧问题上的立场和对待方式。就当前面临的情况,更温和的脱欧可能是特蕾莎·梅的最好选择。编译如下:

目前还不清楚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硬脱欧立场在长期是否能站得住脚。但上周灾难性的议会选举结果使得先前政府在英国脱欧上清晰的路径变得混乱。

选举结果对于“脱欧谈判”有着怎样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心中共同的疑问是:选举结构是否表明公众希望“软脱欧”,英国是否会继续留在单一市场?

人们总是试图按照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解释选举结果。所以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关键事实:两大政党(合并得到82.4%的投票)都不支持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

保守派明确否定了这一想法,并希望通过新的关税政策达成更深入、更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工党曾强调,他们的谈判策略是“强调保留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利益——这对维护英国的工业、就业和商业至关重要”,但同时也概述了控制移民的意图。但到了星期日,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证实工党也将支持离开单一市场。

然而,当人们看到在伦敦等剩余投票地区工党的意愿时,至少其中一部分强烈抵制英国脱欧的力量已经出现,并且这种力量强于预期。这种情况,使特蕾莎·梅议程的其他反对者更受鼓舞,实际上,现在已经很难在她原来的计划上达成共识。

首先,特蕾莎·梅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她和她所在党在议会的地位非常弱,而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谈判代表们知道可以对她施加更大的压力。

另一个原因,来自议会本身的不同构成。特蕾莎·梅所在的保守党在她的战略下相当团结一致,只有少数人赞成留在单一市场。但选举之后,有一群拥护单一市场的苏格兰保守党议员和民主统一党意愿对她的战略表示抗议,后者还认为应该将英国脱欧的相关处理方式复制到爱尔兰问题上。

如果这还不够困难,杰里米·科尔宾已经将更加统一的劳工党定位得非常完美,以便捕捉未来特蕾莎·梅在谈判中可能引起的任何来自国内的不满。

如果保持在单一市场,科尔宾将概述特蕾莎·梅如何背叛脱盟论者。如果离开单一市场,科尔宾将声称特蕾莎·梅在经济上处理的不够好。

这对于特蕾莎·梅来说真是一团糟。我之前认为离开欧盟，但仍然在单一市场中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必须遵守欧盟的规章制度，但对制定这些规则毫无发言权。鉴于欧盟对于服务业的监管，英国要实施有效的商业和贸易政策是极其困难的。同时，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也意味着需要继续缴纳欧盟关税。

然而，现在似乎没有政治资本来推行她原来的议程。更糟糕的是，作为协议的提供方，如果她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大纲，这意味着英国将在脱欧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而真正的隐患是科尔宾领导的未来政府，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在监管、就业法和贸易政策方面进行更多反市场方向的改变。

因此，短期风险较小的经济路径是试图达成一项协议，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继续留在单一市场，并为制定自由贸易协定提供更长期的时间表。至于现在是否触发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款进程，这是留给律师们和政治家们的另一个难题。

本文原题为“A Softer Brexit May Be May’s Best Hope — for Now”。本文作者 Ryan Bourne 是 Cato 研究所“经济学的公共认知”项目的 R.Evan Scharf 讲席。本文于 2017 年 6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与系统性风险

Jon Danielsson, Robert Macrae, Eva Micheler/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英国脱欧可能对金融市场带来相当大的破坏，市场担心这也会增加系统风险。本文回顾了这场辩论，认为系统性风险不太可能增加。尽管法律渠道、规章等价性的失效令人担忧，但在金融市场分割度上升、面临不确定性下市场参与者更加谨慎的情况下，系统性风险更可能下降。编译如下：

尽管英国离开欧盟尚不足两年，但脱欧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令人担忧。两位重要的央行行长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马克·卡尼（Mark Carney）表示担心，而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则更乐观。与德拉吉的看法大体一致，我们认为英国脱欧更倾向于使系统性风险下降，引发风险上升的可能性较小。正如 Baldwin（2016）和 Danielsson 等（2016）研究所示，英国脱欧将对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破坏性，带来相当大的操作风险和巨大的成本，然而谈到系统性风险时，门槛相当高。

系统性风险是内生的

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体系关键部分崩溃并蔓延至整个体系，引发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萧条的极小概率事件。IMF 危机数据库（Laeven and Valencia 2012）指出，OECD 国家平均每 42 年才会发生一次危机，这还是高估的水平，包括一些相对无害、纯粹的金融事件，真正的系统性危机更像一生一遇的事件。

巨大的损失或对金融市场运作的重大破坏，本身并不构成系统性风险，后者还需要更多条件，而最明显的风险类型可能并非系统性的。例如，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次贷市场的两个相同损失影响非常不同，股市发生 2000 亿美元的损失几乎不会引发连锁反应，而次贷市场类似规模的损失导致了我们的这一代最大的金融危机。

不同之处在于“未知的未知”。我们预期并准备好了应对股市的损失，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次贷市场的损失是个巨大的意外。由于制度限制和竞争压力，即使相信这可能发生的人也无法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虽然我们知道该如何降低风险，并且有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做好准备，但我们无法为“未知的未知”做同样的准备。

对金融风险的大多数分析都将其视为外生的，认为它是市场可以应对但无法影响的。虽然这个假设可以简化建模和决策，但风险外生性的假设并不适用于系统性风险，因为其来自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他们有各自不断演化的状况、目标和信息，正如 Danielsson 等（2009）讨论的那样。

当我们质疑长期研究的隐含假设时，往往会发现内生性风险。市场对“格林斯潘对策”或 AAA 级 CDS 流动性的依赖程度很难观察。为应对内生性风险，

我们需要一些制度的巨变，打破部分假设或信念，以面对以往乐于接受的头寸变得毫无吸引力、资产以任何价格出售甚至贱卖的局面。具有高杠杆、高流动性、高信任度和国际化的机构最需要重新评估，比如欧洲共同市场中的许多头寸。如果英国退欧会引发系统性后果，可能的正/负面影响如下。

好消息

好消息是，英国退欧主要通过两个渠道降低系统性风险。

- 首先，这会增加不确定性和恐惧，促使市场参与者努力寻找问题并谨慎操作。金融业已经预见了许多与英国退欧相关的问题，并在积极准备加以应对，因此新问题的出现应该不会令人震惊，从而不太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 第二，英国退欧提高了市场分割程度。统一规则、低摩擦成本的高度集成系统存在很多漏洞，比如由诸多中介构成的长链条和相互依赖关系，使局部问题更容易在整个系统内传播。高度集成系统还倾向于单一化，导致最适应监管环境的商业模式大行其道。尤其在和高额固定监管成本等进入壁垒相结合的情况下，这样的系统会鼓励“大到不能倒”的机构诞生。

把英国从欧洲金融体系中剥离出来会降低金融市场效率并增加其脆弱性，但这一举动和贸易壁垒的存在也降低了两个金融系统同时崩溃的可能性。因此，只要贸易壁垒不至于过高，退欧将有助于保持两个系统的多样性。尽管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市场分割并不好，但这降低了系统性风险。

坏消息

英国退欧也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尽管市场一直在担心、计划和防范，然而，如果某个阶段新的恐惧突然出现，或是抵消或对冲风险的信心突然消失，系统性风险仍然可能降临。如果上述情况足够令人惊讶、足够普遍，并且早期的恐惧指向了错误的目标，就可能导致系统性危机。有两个领域令人担忧：法律渠道和等价性，尽管其并非导致系统性风险的根源。

英国退欧后，清算或再抵押权等无聊的、完全世俗的功能的法律地位是否会受到质疑？显然，这些功能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很好的基础，40年前英国也有相应的法律。但是，当这些功能被完全移植到英国法律中，是否可能打破现有格局？

英国退欧肯定会暴露出良好合同关系中的新问题，就像雷曼破产导致国际互换与衍生金融产品协会（ISDA）的部分规则在法庭上以许多人意外的方式加以解释一样。真正的问题是，是否任何问题都足以引起系统性事件。无疑，这些规则将被监管机构应用，以使市场像以往一样运作。只要时间充分，总能找到合理

的解决方案。在此情况下，不确定性很容易诱发危机，市场参与者很可能立即停止那些受到影响的活动，直到能够获得足够的保证。

这种预期和行为的跳跃是许多系统性危机的核心，包括 2008 年，当市场担心类似美国国际集团（AIG）和雷曼兄弟的破产可能进一步发生时，就停止向金融行业的交易对手提供贷款，直到政府保证不会再有银行倒闭。不幸的是，法律的日程表很漫长，如果法律的“管道”确有可能失败，英国和欧盟各国政府可能需要一些方法辨识出受影响的活动，直到“泄漏”得到解决。

另一个引发系统性危机的潜在途径是等价性——对外国机构和法规的处理在功能上视同等价于国内机构和法规。如果英国是欧盟成员国，金融机构可以放心地假设一国的规章适用于所有成员国，所以如果一家金融机构遵守英国的规定，就相当于遵守了欧盟任何地方的规定。

当英国脱欧后，这种永久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等价协定。欧盟可以选择承认英国的规则，但就本质而言，此类协议是短暂的，原则上可以撤销，并在短短数月内才通知。如果金融机构的运作原本以永久等价性为前提，而现在等价性被撤销或暴露了一个隐藏的、只在市场面临压力时才显现的弱点，那么，金融机构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避免过分依赖规则等价性的需要有悖于运用这一概念的初衷，因而存在许多潜在问题，尽管市场参与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预计欧洲和英国当局都将相当谨慎地处理等价协议的终止。

结论

当我们突然质疑现有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假设，并且得到了不喜欢的答案时，系统性危机就会发生。这一情况可能通过法律渠道、规章等价性的失效等方式在英国脱欧时发生。

然而，英国脱欧不太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虽然英国脱欧很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市场分割度、摩擦成本和不信任，但这些都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尽管从其他角度上看代价昂贵。在与英国脱欧谈判的所有商业、国家和区域利益竞争中，金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相对较低。

本文原题为“Brexite and systemic risk”。本文作者为 Jon Danielsson，伦敦政经学院系统性风险中心主任，Robert Macrae，CFA，和 Eva Micheler，伦敦政经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5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只要央行保持稳健货币政策，就无需担心比特币

Daniel Heller/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变化导致了数字货币的产生，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是由中央银行或者商业银行发行的，背后也没有政府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比特币。由于比特币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一端到另一端的轻松转移，许多人认为未来其终将取代货币。但是作者通过对其特点，风险的分析，认为这并不会成为现实。编译如下：

如今存在着很多种形式的货币，主要有实体和电子货币两种类型。实体货币包括银行支票和金属货币，通常由中央银行发行。电子货币包括金融机构在央行的（非现金）存款，家庭和公司的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以及电子货币。电子货币包括芯片卡或者硬盘驱动器内存储的货币价值和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可以由中央实体发行，也可以由电脑系统以一种去中心化的形式发行。它的面值不由主权货币决定。比特币就是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代表。去中心化货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结算是客户对客户的，没有可信赖的第三方货币的中介。这一特点也有银行支票和金属货币非常相近。

早期，比特币的价值不足 1 美元。2013 年 12 月，比特币的价值飙升到了 1150 美元。2014 年，贬值到了低于 200 美元。2017 年 3 月，又创下了 1285 美元的历史新高。从此，其价值就在 940 到 1200 美元之间波动。根据 IMF 的数据，比特币价格的波动比任何主要资产都要大。目前，比特币的全部市场价值达到了 200 亿美元。这相当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相关流通中纸币价值的 35%。而比特币的交易量也稳步上升到每日 35 万左右（图 1）。由于处理系统容量的限制，交易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系统的容量已全部耗尽并且“面临着严重的可扩展性障碍”。目前已采取了一些短期措施，比如交易将排队进入等待序列，收取交易费的交易将被处理的更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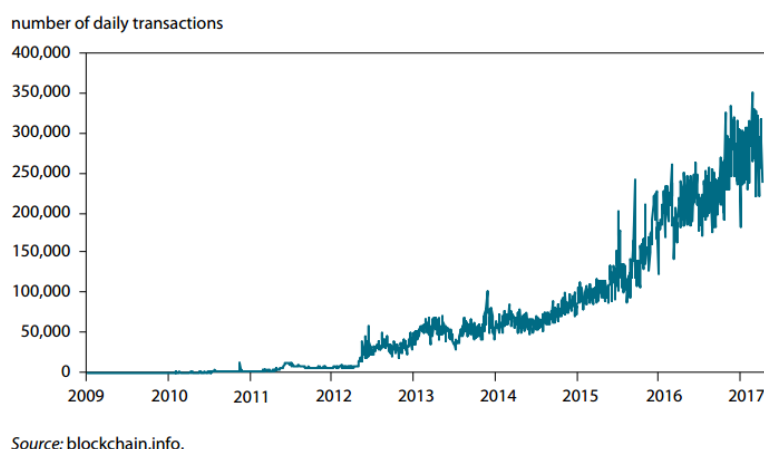


图 1. 比特币每日交易数量

正是因为这些容量限制，像传统的票据交换所一样的第三方监管人出现了，解决比特币交易的一些内部问题。比特币社区也正在讨论如何以一种可持续方式扩展容量。

2013 年以前，比特币主要与美元兑换。而中国投资者突然兴起的兴趣也使得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2014 年起，95% 以上的比特币交易都是与人民币进行兑换。但是这一盛况在 2017 年崩塌，因为中国外汇停止了保证金交易，并引入了交易费用。目前美元占据了比特币 50% 的交易量，其后分别为人民币，欧元和日元（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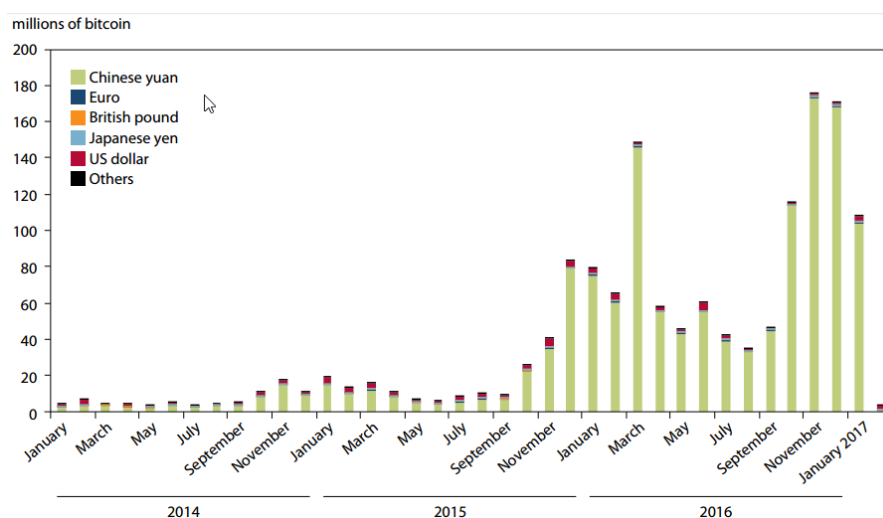


图 2. 各种货币的比特币交易容量，2014 年 1 月到 2017 年 2 月

像比特币一样的可转化数字货币很容易被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相对于在规范金融体系内的非现金交易，它提供了更大的匿名性。即使比特币的总账是公开的，支付知道的只包含了交易对手的字母数字标识符，而非其真实姓名。

2015 年，金融行动特别工程组（FATF），一个政府内部用来发展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有关措施的机关，发布了国际指导意见。它认为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措施需要在电子货币和规范化金融系统的交集处实施。数字货币交易必须保证达到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要求。这些条款并非针对数字货币本身，而是将其转化为主权货币的基础设施。

税务机关将比特币看成需要申报的资产。2016 年 11 月，国内收入署被授权查找美国进行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交易的纳税人信息。

那么比特币是否安全？在其分配系统中存在着三个特征来保证其安全。首先，它可容错，因为它依赖于许多分散的组成部件。其次，它对攻击有一定的防御能

力，没有中央电脑使得攻击和操作都更加昂贵。第三，它可以反贪污，因为参与者们很难牺牲他人利益而使自己获益。

尽管有这些好处，比特币也存在着弱点。首先就是“51%的攻击”。如果超过半数的参与者（挖矿者）同意，一笔比特币的交易就被承认合法。所以有可能有51%的挖矿者联合起来发动攻击。鉴于过去和当前挖矿者的集中程度，这个风险是存在的。第二个风险来自于比特币的不记名性。任何持有比特币钱包私人钥匙的人都可以享用其内容。如果丢掉钥匙，也就丢掉了财产。丢失私人钥匙的风险并非假设，而是确有有关事实发生。一家东京的提供保管私人钥匙的公司在三年内被黑客攻击了两次。尽管之后加强了相关保险措施，类似的事情仍有发生。

在讨论过安全问题后，最后再来看一下比特币作为货币的功能如何。只有当人们确认其他使用者会接受时他们才会选择某种中介作为支付方式。这种意愿度则随着用户数目的增加成指数增长。尽管交易数量一直在增加，比特币在交换媒介上仍然扮演着较弱的角色。比如比特币交易价值小于中国刷卡消费价值的1%。目前只有9000个商家接受比特币，而接受Visa和Master卡的商家则有3700万。尽管中国集中了比特币的大部分交易和挖矿行为，但是目前没有中国商家接受这一支付方式。

大部分比特币都被储存起来，而非被用于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因此比特币被持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投机，而非商品交换的中介。由于使用比特币的交易很少，作为一种记账单位，比特币只是偶尔被使用，比如在数据区块链组建时的众筹中或者赌场中。

给予比特币汇率变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2013年下跌，又在其后的一年迅速攀升。最近又有下跌的趋势。如果比特币是记账单位的话，这对于整体经济无疑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种货币应该是好的价值贮存工具。而要达成这一目标，货币价值必须是稳定的，比特币则远远无法做到这一点。其价格波动明显，属于高风险资产。

最后，因为比特币的供应量有2100万的数量上限，一个以比特币为标准货币的经济将最终走向紧缩的局面。因此，一种有着更高级别储存机制的模仿者货币将会很快出现并取代比特币。比特币价格将会崩溃，导致高的通货膨胀。

本文原题为“Do digital currencies pose a threat to sovereign currencies and central banks?”。

本文作者 Daniel Heller 为 PIIE 的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意味着什么

Rob Bailey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特朗普已经公布从 2015 年由 150 个国家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中退出的意图。能源、环境与资源研究室主任 Rob Bailey 与 Gitika Bhardwaj 谈及了此举的后果。他认为，此举对巴黎协定来说会是一个打击，而中国则可能因美国的退出而获取领导地位。编译如下：

此举会对美国和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对巴黎协定来说会是一个打击。讽刺的是，美国在最后阶段推动了巴黎协定的协商，并且使它的设计倾向于美国。所以此时美国退出会是十分令人失望的。

但是我不认为这会对全球排放产生你所想象的恶劣影响。确实，美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我认为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时，对全球排放的恶劣影响就已经造成了。当时，所有人都开始降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我认为美国会持续减排，因为一系列应对环境问题的措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不仅只在政府层面。

另外，此举也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影响。尽管特朗普如此认为未来是煤炭的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其他国家会转向使用清洁能源，建立创新导向的经济。对于美国的长期利益来说，走在改革的前列是大有好处的——如美国可以得到人才资源，投资研发领域，以及建立低碳经济。退出巴黎协定并不会对此有所帮助。

谁会成为特朗普此举的最大输家？

最终，没有人可以从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退出世界唯一的多边气候协定中获益。但是抛开气候问题，从软实力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谈起，此举会使领导位置空缺，而中国则有野心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提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表明，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巴黎协定的中国有担任领导位置的意愿。

唐纳德特朗普提到美国对气候金融做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贡献。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对气候金融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美国投入了大约 30 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资金提供者，但这是自发的行为。巴黎协定并未规定美国出这些钱。而美国之前的政府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所以这不是退出巴黎协定的好理由，这只是一个重新审视先前决定的理由。

特朗普一再提及退出巴黎协定会提供工作机会，并节省美国纳税人的钱，尽管数据显示使用风力或太阳能会带来比使用煤炭资源多两倍的工作机会。他这么说有理由吗？

我不这样认为，因为美国从巴黎协定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它使得美国可以设定自己的气候目标，并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提出相同的要求。所以我不清楚特朗普从重新制定协定中会获得什么。

而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拒绝也并不让人惊讶，因为这会产生时间的浪费和方向的偏离，2020年之前的准备时间中的行动也会产生混乱。

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都不可以正式退出协定。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他第二次竞选失败，美国依然可以保留协定吗？

各国可以在获得批准后的三年间提交退出的申请，然后就会有一年的时间来完成退出，所以美国在2020年11月前都不可以退出巴黎协定，而这也正式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时点。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特朗普没有竞选成功，下一届总统可以停止退出进程，美国仍然可以留在巴黎其后协定中。我们失去的则是本可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三年时间。

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特朗普决定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巴黎协定是基于它产生的，而这可以在一年内完成。但这就意味着美国将与所有环境事务隔绝。

特朗普认为美国将会因协议而损失一些东西，而中国和印度则在协定中获利。他的观点对吗？

他似乎认为巴黎协定允许中国和印度开始煤炭挖掘，但却强迫美国关掉煤矿。但是公约中并没有对美国做出这样的限制，而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机会。

协定中确实允许各国政府依据国情设定目标和政策。所以理论上如果美国想要开办煤炭，巴黎协定不会禁止。而阻止美国这样做的是经济原因：能源革命使得美国失去了这样做的竞争力，这才是美国关闭煤炭的原因。退出巴黎协定并不会影响基本经济。

特朗普最近宣布撤除能源部门。这对美国能源利用率和可再生资源产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会对联邦资金产生限制。无论气候经济是否会衰退——气候经济衰退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用作减排的资金会更少——他们都会降

低减排的力度，从而导致全球排放的增加。同样，美国削减此类开支（包括从能源利用率和可再生资源到环境变化问题的开支），会对气候变化产生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美国产生，还将影响到整个世界。

美国公司与城市将如何应对？像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州会继续投资可再生资源和创新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吗？

我想这会刺激它们。大约有 30 个州设立了投资可再生资源的目標，并且编制了减排进程，所以它们没有理由停止。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华盛顿州，纽约州，新罕布什尔州——这份名单还在继续。特朗普的行为不会改变这些州的行为。

但是，美国政府可能会阻碍一些州应对气候变化的过度行动。但是当局希望就此问题与各州陷入扯皮吗？又或者有更好的方案？

特朗普宣称投资清洁能源的经济不会增长，他对吗？

低碳经济确实增长了。低碳经济在过去十年间有所下降，但低碳技术已经开始产生经济效益。可再生资源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使用光伏系统的成本在过去五年间下降了 80%，风力资源也变得更加廉价，尽管其降价速度不如太阳能那么快。

另外，电池技术的成本也在飞速下降。所以清洁能源经济不会停滞不前。事实上，根据数据来看，值得怀疑的是继续投资化石燃料和核能源是否有意义。

本文原题为“[What Trump’s Withdrawal from Paris Means for Global Climate Action](#)”。本文作者 Rob Bailey 是 Chatham House 能源、环境和资源研究主任。本文于 2017 年 5 月刊于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穆迪对中国严重的债务问题拉响警报

Desmond Lachman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穆迪评级机构调低中国的信用评级的做法是正确的，中国的目前信贷泡沫非常严重，且在国际储备和经济转型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编译如下：

穆迪评级机构终于鼓起勇气调降了中国的信用评级，这种做法值得称赞。如果穆迪不这样做，其作为评级机构的信誉将会受到质疑。此案例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面对一个国家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时，评级机构可以采取主动的方式有效反映情况。调降一国的信用评级为债权人拉响了贷款风险警报。同时，通过劝阻各方向该国贷款，评级还能有效警告该国政府采取补救措施，从而使其财务状况走上健康之路。

遗憾的是，由于评级机构的客户往往是发行人，而非贷款人，因此他们往往难以迅速对该国不断恶化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作出准确评级。鉴于这个原因，穆迪最近调降中国评级的做法更值得称赞。

尽管可以预见到中国政府会抗议这一结果，但还是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穆迪的做法是正确的，中国的政府债至少已经和日本政府在一个水平。更引人注意的原因是，过去的八年里，中国的信贷规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根据 IMF 估计，自 2008 年以来，由于中国政府强力推进政策来提振经济，中国的非政府部门信贷占 GDP 的比重增长了将近 100%。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由此产生的信贷泡沫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美国 2007 年房地产泡沫和日本 90 年代失去的十年的规模。

与此同时，中国的信贷泡沫已经在全国各地催生出“鬼城”，并使得中国的很多重要产业产能过剩。

历史上，即使那些比中国目前的信贷泡沫还小的国家都经历了困难的时期。鉴于此，我们可以预见多年以后，中国的银行将充斥着不良贷款，而僵尸企业则将比比皆是。

参考日本的案例，我们可以预计中国信贷泡沫的破裂将使其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低速增长，而这反过来也会为其摆脱债务问题增加困难。

认为穆迪的做法正确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的评估会严重影响其在国际上的地位。过去，中国能够保持良好的信用评级的主要因素是其强大的外汇储备，最高时超过了 4 万亿美元。而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由于经历了严重

的资本外流问题，中国的国际储备已经骤减了约 1 万亿美元。因此，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降低至 3 万亿美元左右。

中国还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过去 30 年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模式中寻求转型，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情况下，这一转型更加艰难。美国日益壮大的贸易保护主义阵营将不能容忍中国借助大量的贸易顺差和汇率优势来获得竞争优势。

我们希望，穆迪的做法能够成为警钟，促使中国政府着手解决信贷市场相关问题，同时警示特朗普政府做好应对恶劣国际经济环境的准备。

本文原题为“Credit Moody’s for sounding alarm on China’s serious debt problem”。本文作者 Desmond Lachman 为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研究员，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政策发展和评估部主任以及所罗门美邦公司的新兴市场经济分析师。本文于 2017 年 6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那些应该被忘掉的经济思想

Bruno Frey 和 David Iselin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悠久、体系庞杂的学科。时代在不断前行，经济学的思想和观点也应该与时俱进。然而，是否有一些我们依然笃信的经济思想已经过时？若是如此，这些过时的思想又会给社会造成哪些麻烦？本文梳理了一些已经过时的经济思想。全文如下：

经济学是一门体系完备的学科。如今，全世界学习经济学的学生都在使用非常相似的教材。不仅如此，他们还使用大体相同的理论、方法和实证工具。的确，全球经济学界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然而，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待解释的难题和疑问，尤其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的待解之谜越来越多(Coyle 2012)，比如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仅仅狭隘地强调各种均衡，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Kirman 2012)，再比如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负利率问题？对于那些缺乏定价的交易行为，比如方兴未艾的共享经济，我们又应该如何量度？我们认为，经济学界有必要重新审视目前的体系，看看哪些理论依然有效，而哪些理论是过时的，需要我们进行调整。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说的那样，“真正的问题往往并不在于新的理论，而是在于那些旧的、过时的理论当中。这些错误会潜移默化地深入我们的脑海，并且顽固地误导人们诸多的决策。”如今，那些过时的经济学理论也同样深深根植在不少经济学家的脑海中，误导着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约翰·昆根(John Quiggin)在 2012 年的著作《僵尸经济学：过时的观点是如何持续误导人们的》中，将那些过时的经济学观点称为“僵尸观点”。具体来说，“有效市场假说”和“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是两个最为流行的“僵尸观点”。约翰·布鲁克曼(John Brockman)在 2015 年出版的《那些必须消亡的观点》中，也对这些老旧的经济学思想做了很多批判。

诚然，经济学家确实时常受到其他领域人士的抨击。比如，理性预期假说就时常受到金融市场人士的批评，经济学家假设人的效用仅仅取决于消费和闲暇，也被很多人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公众对经济学思想的应用来看，也有不少社会流行的经济学结论应该得到调整和修改。比如，许多政府项目都是基于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制定的，这当中有不少结论已经不为现代经济学界所支持，包括长期来看增加公共开支可以促进就业、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创新的项目真正促进创新，以及废除纸币可以减少腐败、漏税等。

但是，即便在经济学界，那些专业的经济学研究者对一些更新、更贴合实际的观点也接受得较为缓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 GDP 的概念。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指出，GDP 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Stiglitz 2009)。欧盟

委员会也已经提出一个“超越 GDP”的方案，希望能构建出更有代表性、更全面的指标来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还在继续使用 GDP 作为最重要的宏观指标之一。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在经济学基本假设里，人均 GDP 和人均消费几乎是衡量个体福利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联系在一起，任何能够最大化 GDP 增长的事情也一定能够最好地促进国民福祉。然而，越来越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主观福利非常复杂，也很难简单地被单一外部指标所衡量。

类似的问题包括“涓滴经济学”和先富带后富的理论。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普遍的经济增长会惠及所有国民和产业，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任何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在不同产业的分布都是不均等的，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往往是一些产业的增长和另一些产业的衰退。其次，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在不同个体间的分布同样不均等。举例来说，如果收入在前 5% 的个体获得了 20% 的经济增长，而收入在最低 5% 的个体仅仅分享了 2% 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件好事吗？当然，有人会说穷人的状况还是改善了，但富人和穷人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这无疑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呢？有人认为，提高国民的总体幸福指数应该是每个政府的天职。但我们不敢苟同，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没有一个政府是全能、不受约束的；第二，我们应该采取哪种指标来衡量人的幸福程度？第三，度量幸福程度背后的道德标准应当是怎样的？比如，为了提高人的幸福指数，我们可以接受给自愿需要毒品的人发放毒品吗？

正如上述例子所阐释的那样，全面而动态地评估经济学当中的诸多观点，对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进行修正和改善，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思想是创新背后的源动力，无论政治、科技、艺术还是经济领域都是如此。正如雨果的名言所说：“一旦时机恰当，这世上没有比思想更有力的东西了。”但我们也应当牢记，当我们曾经笃信的思想开始落伍时，对这些过时的思想抱残守缺也可能招致始料未及的恶果。

本文原题为“Economic ideas you should forget”。本文作者 Bruno Frey 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终身访问教授，David Iselin 是瑞士苏黎世理工大学的研究员。原文于 2017 年 5 月发表在 VOXEU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在韩国发展的不确定时期，文在寅开始执掌韩国政权

Scott A. Snyder/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2017年5月9日，在韩国举行历史性的大选中文在寅当选为韩国新任总统。在当天，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在韩国发展的不确定时期，文在寅开始执掌韩国政权》一文，作者从文在寅当选新总统的得票率、其重返自由外交政策、面对的新障碍、新的世界格局和狭小的犯错空间等方面展开叙述。编译如下：

在韩国举行历史性的选举之后，进步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当选为韩国的新任总统。韩国大选出口民调显示，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以41.4%得票率领先。保守的自由韩国党候选人，也是文在寅最激烈的竞争对手洪准杓以及其他的政治对手都宣布败选，退出竞选活动。

由于朴槿惠被弹劾案和全国选举活动被压缩等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当选总统文在寅在韩国就职的相关仪式被取消，文在寅将立刻开始其总统工作。但是，作为韩国的现任总统，他将很快迫于紧张的东北亚局势而重申韩国政治领导层的缺失。

尽管希望提高韩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是文在寅总统仍然会在执政方面经历艰辛的学习过程。

重返自由外交政策

文在寅在竞选活动中宣称其外交政策模式是回归自由的外交政策。这是10年前，即保守派重新执掌青瓦台之前，文在寅的政治导师、良师益友卢武铉所遵循的外交政策。

在卢武铉执政时期，文在寅担任卢武铉政府的幕僚长。在维持美韩联盟中追求更大的自由权，在中美之间的立场上韩国追求更大的平衡位置，并强调通过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促进朝鲜半岛和区域间的安全合作。

但是，文在寅政府重新回到坚持自由外交政策道路时，却不得不面对许多十年前不存在的障碍。

新的障碍

首先，文在寅对韩国政权的交接意味着他和他的团队必须在24小时内从竞选活动转向新政府执政。文在寅将担任一个过渡政府的总统，这种状态将一直保持到新总理和内阁可以赢得不受共同民主党控制下的国民议会的批准为止。

国民议会内部达成共识的必要性将影响文在寅政府内阁的选择，并将限制他通过法律支持其政策议程的能力。

韩国的态度将对文在寅的自由外交政策形成第二个约束。虽然在国内需要开展一个针对政府官员的清洁廉政的工作，但是公众对与华盛顿安全联盟的认可和对中国担忧是比较高的，而对与朝鲜的合作期望比较低。过去十年来，韩国公众对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保持了保守的态度，因此需要时间为进步党文在寅政府建立成功的外交记录，进而扭转这一趋势。

不同的国际格局

第三，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文在寅更难以实施其执政平台内的多元素策略，而这些策略曾经是卢武铉政府优先选择实施的政策。

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金正恩将自己的生存与核项目联系在一起。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限制了文在寅执政前所允许的很多经济活动，另外韩国企业受到在朝鲜设立的开城工业园区停业的影响，其正在加紧应对此事。

文在寅和他的顾问们必须说服朝鲜扭转其核轨迹，这样共同韩国市场的梦想才可能具有可行性。

第四，在韩国陷入政治领导真空状态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已经制定了针对朝鲜的相关政策。而韩国虽然存在着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但是自文在寅上台执政后，开始设置针对特朗普政府偏好的具体策略。

狭小的犯错空间

为了成为韩国利益的有效倡导者，自由主义者文在寅必须弄清楚如何与特朗普进行对话，以及如何不被迫按动可能危及美韩关系的按钮。事实上，文在寅使得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的合作协调性更加深入，比 10 年前卢武铉政府更能帮助联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不良化学行为会破坏美韩两国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繁荣的东北亚地区的利益。

为了取得韩国的成功发展，文在寅必须恢复韩国民众对国内领导机构的信心，同时领导韩国在东北亚狭窄的战略空间中不断前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时间将会证明文在寅是否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本文原题为“Moon Jae-in inherits leadership at an uncertain moment for South Korea”，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韩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韩政策项目研究主任 Scott A. Snyder。本文刊于 2017 年 5 月 9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虽有良好迹象，但中国的对朝政策并未改变

Derek Grossman/文 章珏/编译

导读：近日，美国官方和民间对于中美之间合作解决朝鲜问题持有高度乐观态度，但是作者认为，中国政府日前表现出来的合作姿态只是为了向新政府示好，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在朝鲜问题上的诉求是维持边境稳定。但中国确实对金正恩政权日益失望，因此，美国决策者要向中国施压，提高双方决策透明度，并向其传递开展合作利大于弊的信息。编译如下：

近日，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大家就中国将按照美国的利益去惩罚或者影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持高度乐观态度。在 19 日的采访中，副总统彭斯称中国正对朝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措施。

至少从表面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确实向特朗普展现了合作姿态。2 月，中国政府称将拒绝接受朝鲜的煤炭进口，并在本月遣返了朝鲜的运煤船队。在习特会和朝鲜最近一次导弹试射失败后，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我们必须改变现状。

虽然很鼓舞人心，但实际上中国会采取这些行动更可能是出于向美国新政府示好的考虑，而不是真的想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已经多次表示其首要战略利益在于确保中朝边境的稳定，而不是与美国以及六方会谈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促使半岛无核化。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倾向于支持金正恩政权以防止边境出现难民潮，并于未来在美日韩联军和中方之间保留一个缓冲区。

事实上，中国在过去采取的行为显示了其只想维持现状的诉求。2013 年 2 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实施新的贸易制裁和减少对朝能源供应，但仍坚持维持双边外交和经贸联系。2016 年 3 月第五次核试验后，中国政府努力将安理会对朝制裁控制在减少支撑发展核项目的能源供应，而不涉及威胁其政权稳定的能源制裁。这或许意味着中国政府仍会继续接受朝鲜的煤炭，毕竟朝鲜的煤炭出口占其总出口的 40%。而中国政府能否坚持最近出台的煤炭禁运却是检测其是否愿意对朝鲜施加重压的重要指标。

最近，中国政府称其对朝政策是影响和支持而不是惩罚。中国政府在 4 月透露，其与朝鲜的双边经贸额度在第一季度较去年同期增长 37.4%，进出口都有增长。此外，多年以来，中国某些影子公司和银行一直在支持金正恩政权逃避国际审查，为其提供资金使其获得核项目的关键技术。而我们很难衡量中国政府在这层地下网络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金正恩正日益失望，无论是其不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或者是采取其他可能的挑衅行为例如刺杀一直受中国政府保护的金正男。今年 4 月，中国半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公开发表言论批谴责金正恩为“敌

对政权”，并暗示中国将不再视金正恩政权的存在为维稳的必要条件。不久后中国政府就宣称禁运朝鲜煤炭，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

然而，中国对朝持续的支持和保护会使得美国决策者怀疑其在对朝合作上的诚意能维持多远。特朗普的推特——“我有信心中国会对付朝鲜，但若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将采取行动。”或许反映了华盛顿的腔调，即其寄希望于中国能挥舞大棒，但同时也准备了备选方案。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是有效的，并有利于建设良好的中美双边关系，只要双方提高决策透明度，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误解和误判会上升。

对于可以通过与中国建立更好的贸易关系来解决朝鲜问题这一观点，美国的决策者应该持怀疑态度。如果这么做的话，中国就会将贸易问题与更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相捆绑，中国可能以此紧逼美国放弃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并寻求美国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的支持。相反，特朗普政府应该努力影响中国行为，使其相信放弃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将使得朝鲜的未来更糟糕。

本文原题为“Despite promising signs,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 unchanged”。本文作者为前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情报官，现任兰德公司首席国际防卫研究分析师Derek Grossman。本文刊于2017年4月24日RAND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朝关系发展状况

Eleanor Albert/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在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测试、美国特朗普总统放弃“战略忍耐”策略实行压力迫使其放弃核武器以及韩国开始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发展环境越来越不稳定。其中，中国作为朝鲜的邻国、友好盟国在应对这一系列事件时略显被动，尤其是朝鲜的独断专行甚是让中国压力倍增。2017年4月26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中朝关系发展状况》一文，作者从政治、经济贸易合作与支援等方面叙述了中朝两国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叙述了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不同角色特征，最后展望未来叙述了朝鲜、中国将会面临的状况。编译如下：

引言

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盟友，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食品和能源的主要来源国。中国一直在帮助维持金正恩的政权，至今也一直坚持反对对朝鲜进行严苛的国际制裁以期避免朝鲜政权的崩溃和朝鲜难民涌入中国的边境线内。平壤的第五次核试验和正在进行的导弹发射使其与北京的关系呈现复杂化，中国一直主张恢复六方会谈，希望在多边框架下实现朝鲜的无核化。自从金正恩上台执政后，朝鲜开始清理高层官员，其中金正恩在马来西亚流亡的兄弟金正男遭到暗杀的事情，激起了中国对朝鲜领导人执政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关切。然而，中国的政策对于遏制邻国的核野心没有什么用。

压力下的联盟

中国对朝鲜的支持可以追溯到朝鲜战争（1950-1953年），当时中国部队遍布朝鲜半岛来援助北方盟友。战后，中国向朝鲜领导人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金正日（大约1948-1994年），金正日（大致1994-2011年）和金正恩（2011-）。平壤2006年10月开始试验核武器，北京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平壤实行制裁的第1718号决议，之后中国和朝鲜的紧张关系开始出现。随着这项决议和其他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第1874、2094、2270和2321号决议）的实施，北京对朝鲜的态度从外交手段开始转向惩罚。在朝鲜2016年9月实施核试验之后，中国呼吁朝鲜不要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尽管如此，北京仍与朝鲜有着广泛的联系，包括经济交流和高层国家领导人访问，如中国共产党高级成员刘云山于2015年10月参加朝鲜执政党成立七十周年的活动。

另外，中国阻挠针对朝鲜侵犯人权的国际性惩罚行动。中国批评了2014年2月联合国有关朝鲜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酷刑、强迫饥饿和危害人类罪的详细报

告，并试图阻止 2014 年 12 月和 2015 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有关该国人权状况的会议。

甚至中国的惩罚性措施也受到制约。在联合国第 1718 号决议修正取消了针对奢侈品之外的对朝鲜实施严厉经济制裁的要求后，北京方面才同意通过此决议。此决议中还涉及对朝鲜的进一步制裁，其中包括要求对可疑的核导体或导弹贸易进行检查，但西方官员和专家怀疑中国将如何实行对朝鲜的贸易限制。

中朝贸易呈稳步增长态势。2014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68.6 亿美元。据韩国贸易投资促进局的数据显示，尽管中朝两国近期贸易额有所下滑，但双边贸易额在 2000 年至 2015 年间上涨了十倍。

另外，北京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来限制平壤经济的发展。2017 年 2 月，中国商务部宣布从现在开始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这一举措提高了联合国对朝鲜制裁的有效性。北京之前在 2016 年 4 月曾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但是民生物资依然可以进口。但是据报道，自从实行新的禁令以来，一些携带煤炭的船舶在中国港口处被拒之门外。中国半官方报业环球时报在 2017 年 4 月的一篇社论中提出，如果平壤进一步进行核试验，中国可能会支持采取禁止向朝鲜出口石油的措施，这也反映了一些中国专家的相关呼吁。区域专家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能是中国对平壤“失去耐心”的表现，而有些则说北京这些转变只是一种战术。

对平壤的援助与贸易合作

中国向朝鲜提供大部分的食品和能源用品，占朝鲜贸易总额的 90% 以上。相反，中国从邻国购买的物品包括矿物、海鲜和服装。2017 年第一季度中国与朝鲜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 37.4%，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Eberstadt 写道，中国目前是朝鲜唯一的经济支撑者。

2015 年 9 月，两国开通散货和集装箱航线，有助于朝鲜将煤炭出口到中国。另外，中国在其边境城市丹东与东北部辽宁省省会沈阳之间建立了高速铁路。2015 年 10 月，国民边境贸易区在丹东开放，旨在促进双边经济联系。这就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和 2002 年初期，在朝鲜建立的罗先经济区和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一样。丹东是贸易、投资和旅游业的重要枢纽，与朝鲜的交易占了该市总贸易额的 40%，通过丹东和新义州的进出口贸易占到了 70%。然而，一条花费 3.5 亿美元横跨鸭绿江联通丹东和新义州的新大桥至今在朝鲜边界处没有完工，这也象征着中朝关系的遇冷现象。不过，由于朝鲜日益受到孤立，所以对中国的依赖在进一步加深。

北京还直接向平壤提供援助，主要是粮食和能源援助。自 1995 年以来，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向朝鲜提供了 75% 的粮食援助，但自 2009 年六方会谈崩溃后，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捐款大幅收缩。朝鲜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饥荒死亡人数达 80 万至 240 万人，其中 2015 年 6 月份的旱灾最严重，2016 年 9 月份发生大规模洪灾严重损害了收成。联合国机构指定高达 60%，即 1500 万人口遭受着食品不安全的威胁。还有对朝鲜援助分配的担忧，特别是中国没有监管货物进出口的相关系统。然而，最近悉尼大学的 James Reilly 写道：“最近，北京一直在试图让平壤摆脱纯粹的援助，转而寻求更多商业上可行的合作关系”。

中国的优先排序

中国把朝鲜半岛的稳定视为主要利益。对朝鲜的支持保证了在中国东北部边境有一个友好国家可以为中国和存有 2.9 万美军驻地的韩国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Richard N. Haass 讲到，中国领导人不喜欢金正恩的政权或核武器，但是更不喜欢朝鲜政权崩溃和一个以发展资本主义的韩国为首的统一的朝鲜半岛。

北京一直呼吁世界大国不要对朝鲜过分强硬，因为担心朝鲜政权崩溃并引发其危险的军事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 2017 年 4 月敦促美国和朝鲜保持克制，称：一旦战争真的发生了，结果只会造成多重损失，没有人能成为赢家。

成百上千的朝鲜难民如幽灵般涌入中国也是北京的一大担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迈克·马伦称，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可能会牵连到中国，使中国为本国国民提供稳定、安全生活的任务面临更大的挑战。难民问题已经是中国的棘手问题：北京承诺遣返朝鲜人越境逃窜一事引发了人权组织的谴责。北京在 10 多年前就开始修建铁丝网防止朝鲜移民越境，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总数应该超过 2 万，但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有 3 到 6 万名朝鲜难民生活在中国。大多数难民在去亚洲其他地区，包括韩国之前，他们先选择去中国。不过，金正恩加强边界管制后已经减少了朝鲜难民的流出。

尽管北京倾向于和平壤保持稳定的关系，但是也寻求加强与首尔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会见了数次现已下野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但是他尚未访问朝鲜或接受朝鲜金正恩的邀请。2016 年，韩国对中国出口额占四分之一，金额达 1.24 亿美元。但是最近中国已经对韩国企业采取报复措施，反对在韩国东部地区庆尚北部部署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专家说，中国在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承诺保卫朝鲜的问题是矛盾的。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写到：中国有责任介入无端侵略。但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 Bonnie Glaser 说，中国政府试图说服朝鲜领导人撤销迫使北京承担平壤防卫责任的这一条款。北京还表示，如果冲突是由平壤发起的，那么中国就不会遵守其条约义务。

华盛顿的角色

美国敦促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计划，以换取援助、外交利益和关系正常化。但专家说，华盛顿与北京在承担实现朝鲜无核化以及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国际危机组织的 Daniel Pinkston 说：华盛顿认为要使用压力影响朝鲜改变其行为，而中国的外交官和学者对制裁和施压策略持消极的看法。他还说，他们认为这种公开的措施带有羞辱性色彩，并且可能会使结果适得其反。

美国也试图迫使中国更加重视朝鲜。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和国会动议称，将对给朝鲜提供核资金与导弹发展资助的国家、公司、个人实行制裁；一些措施针对在中国境内银行的朝鲜基金，而其他措施则专注于矿产和金属出口行业，包括奢侈品和武器贸易，这些都是中朝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为了加强区域安全，于 2017 年 3 月份开始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即 THAAD。这一活动受到了北京方面的强烈谴责，并将其视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奥巴马总统的行政部门避免直接与平壤进行有关火箭、导弹与核试验问题的谈判，采用了一种被称之为“战略忍耐”的策略。无党派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2016 年的报告描述了此政策，旨在通过坚持对无核化的承诺，试图摇摆北京对平壤的坚定立场，加紧对朝鲜的制裁来压制平壤政权。

随在美国政权从奥巴马政府向特朗普政府的过渡，改变了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特朗普的助手们宣布“战略耐心”的结束，并宣称“所有的选择都摆在桌面上”，包括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来阻止平壤的核试验与发展。特朗普总统也警告说，如果北京不愿对邻国施加压力，华盛顿将准备对平壤采取单边行动。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不能解决朝鲜，我们来”。美国太平洋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说，美国军方正在加紧与日本和韩国盟友进行联合演习，并于 2017 年 4 月派出了一个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进一步遏制朝鲜的核威胁。

不过，美国似乎更有兴趣利用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力来遏制朝鲜。一些专家，包括 David S. Cohen 和 Anthony Ruggiero 认为华盛顿应该施加第二次制裁，

用于惩罚帮助朝鲜前沿公司进行融资的中国银行。其他人担心，实施这样的经济压力和进一步离间平壤的举动可能会激化金正恩的政权诉诸军事行动。也有人质疑中国将朝鲜带回谈判桌进行谈判的有效性问题的，尤其是金政府利用核武器的发展来维持生存，这可能会排除此次谈判产生有效交易的可能性。

展望未来

布鲁金斯学会的 Jonathan D. Pollack 写道：朝鲜自己单成一类。因此，朝鲜领导层确信自己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直接源于它拥有核武器。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可能对朝鲜的核冒险政策不满，但是也会避免采取可能导致朝鲜政权突然崩溃的举动。

目前，半岛政策的失败削弱了降低地区紧张局势的希望。虽然北京、首尔和华盛顿同意将朝鲜无核化作为首要任务，但对于如何最好地祛除朝鲜的核威胁存在不同观点。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朝鲜并不会充当依附中国的友好、稳定邻邦的角色，前美国驻韩国大使和六方会谈代表 Christopher R. Hill 讲到。

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的 Joshua Stanton, Sung Yoon Lee 和 Bruce Klingner 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对朝鲜施加外交和财政双重压力，如果它认为不这样做会导致美国破坏其政权稳定性的话。而中国的压力是否会影响平壤改变其行为还有待观察，尤其是在东北亚越来越不信任的气氛中，朝鲜的核计划对中国维护区域稳定的愿望越来越成构成难题。

本文原题为 “The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hip”。本文作者为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在线编辑、撰稿人 Eleanor Albert。本文刊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 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